目　　录

敬告读者 ……本　社（1）

南洋杂忆 ……胡愈之（1）

桂林——香港——新加坡

我与《南洋商报》

从撤离围城到重归星洲

《风下》与《南侨日报》

·军　事·

刘公岛上的风暴……毕昆山（28）

汪伪海军华北要港司令部——水牢烈火——酝酿暴动——酒后失言——聚餐折箸——日军巡查——身陷囹圄——求成心切——狂飚突起——攻击辅导部——智取基地队——轻取西炮台——席卷派遣队——栈桥歼敌——解放海员——暴动成功——投奔八路——龙须反正——文西命名——牙山会师——征程万里

·政　治·

中华革命党始末 …… 施方白（73）

浩然军事学社的开办与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中华革命党的言论机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沪军镇守使郑汝成伏诛
吴先梅剪除蒋士方
策反苏州独立的曲折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陈其美的补遗
尾　言
北伐亲历记 ……赵春珊（89）
北伐前夕的武昌、安阳
北伐盛时的武汉市
北伐失败时的湖北、河南
略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杨玉清（109）

·科　教·

旧中国西部惨淡艰危的科学活动 ……黄伯易（115）
馋涎欲滴——旗开得胜——“群英会”——
“群儒舌战”——高潮和风波
旧中国的西医派别与卫生事业的演变…… 金宝善（125）
张孝骞与湘雅医学院…… 周文斌（139）

·人　物·

爱国主义学者白鹏飞 ……白　璧（147）
艰难求学——正义为师——效力桑梓——
激浊扬清——颠沛流离——晚年后事
关于白鹏飞事迹的一些补充说明 ……黄贻平（169）
“民主教授”——“大炮”的由来——关于
广西建设研究会——“皮蛋博士”和“蚊
子博士”——不容忤逆
“和平老人”邵从恩 ……彭静中（172）

溥杰自述 ……溥　杰（185）
家庭环境与教育环境
在英美和日本之间徬徨
封建主义思想对我的“加工”
伪满宫内的形形色色 ……万嘉熙（201）
初到伪满——我和溥仪——伪宫内府的
概貌——伪满时期的溥仪——逃往临江——
在沈阳机场上——结语

质疑·补充·订正

对九十辑《现代评论派与王世杰》的一点订正 ……凌其翰（215）
第八十五辑《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经历片断》
的正误及补充 ……刘锦汉（216）

南洋杂忆

胡愈之

编者按：本文追述作者在南洋七年余的生活：一九四〇年去南洋参加《南洋商报》工作；日军侵占南洋后，流亡苏门答腊，隐姓埋名；抗战胜利，有国难投，继续在新加坡创办《风下》、《南侨日报》，宣传和平民主。过去《选辑》有关南洋生活斗争的回忆录不多，本文弥足珍贵。

我在《少年航空兵——祖国梦游记》一书里曾说过："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日，不要迷恋昨日。"我平生除了为追念亡友写过一些纪念文章外，几乎不写回忆文字，即缘于此。现在，我早已步入耄耋之年，许多朋友都希望我写些往事的回忆，帮助年轻人了解过去的生活和斗争。事实上有不少同志已在做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有关南洋的许多事情的回忆文章却所见不多。我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赴新加坡，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星马沦亡期间，和一批进步文化人流亡苏(门答腊)岛，凡三年零八月。之后，又重返新加坡，直至一九四八年三月离新经香港返国，我总共在南洋生活工作了七年余。那七年，不但是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的七年，也是我国人民浴血奋战、摆脱内忧外患，使旧中国蜕变成新中国的关键性的七年，对于我个人，更是难忘的七年……

China

一、桂林——香港——新加坡

一九三九年，我从沦陷后的武汉辗转来到桂林，参加范长江同志主持的“国际新闻社”工作，同时筹备“文化生活供应社”。

记得是文化生活供应社开张的那天，我正在供应社楼上我的住处与同志们欢聚庆祝。忽然，李克农同志来找我，说飞机票已买好，要我马上飞香港。当时国内正是“皖南事变”前夕，局势十分紧张。蒋介石准备同日本人秘密媾和，日本叫蒋介石将共产党、新四军彻底打垮。我党中央曾有密令：为保存力量，凡是不能秘密隐蔽起来的同志，都必须立刻转移埋伏。而象我这样的人，是无法“秘密”起来的。

飞抵香港后，我即去找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人廖承志同志，原来要我去新加坡办报，当《南洋商报》编辑主任。

《南洋商报》是陈嘉庚先生在一九二三年创办的，这时已换了主人，全部股权归大实业家李光前（陈嘉庚女婿）及其弟李玉荣等所有。陈嘉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

“余自民国光复后，矢志为国家社会服务，冀以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故自农工商业而及于教育，旋并创办《南洋商报》，故为商业战之先导。迨民国二十三年初，因世界不景气之影响，各业损失额巨大，致有限公司收盘，《南洋商报》遂亦易主，而与余脱离关系矣”。[1]

尽管股权易主，掌握经营管理和舆论方针大权的董事经理傅无闷，却以一个老报人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敏感，从扩大报份销路出发，使报纸成为拥护筹赈爱国运动、拥护南侨总会、拥护陈嘉庚的喉舌，以适应广大爱国华侨的要求，与同业竞争。该报编辑

1. 见陈嘉庚《告诀言》，刊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侨日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张楚琨一九三九年秋，以《南洋商报》特派员的身份回国采访抗战新闻，同时接受傅无闷的委托，在国内物色一个有名望的新闻界权威人士，担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张楚琨是一个进步记者，主编该报副刊《狮声》，很受读者欢迎。在重庆访问周恩来同志多次，请周恩来同志推荐编辑主任人选，党组织内定了我，由南委廖承志同志办理具体事宜。张楚琨曾把经过详情告诉我：

“一九三九年秋，国民参政会开会，我以《南洋商报》特派员的身份到重庆采访，偕同《南洋商报》特派记者高云览，多次会见周恩来副主席。我介绍了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南侨总会、特别是爱国华侨领袖的情况。周副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和关怀，指示：对于陈嘉庚这么一个为华侨所拥护的爱国华侨领袖，我们应该尽力协助他，爱护他。周副主席高瞻远瞩，认为陈先生只要了解国内抗战真象，了解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他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一定会使他明辨是非，全力支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副主席又问需要我们怎么样帮助？我建议加强舆论阵地，并说到《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无闷要我物色一个有影响、有声望的编辑主任，以改变商报面貌，扩大销路。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位众望所孚的新闻权威人士，一定能帮助陈嘉庚先生的抗日筹赈运动。周副主席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叫我去香港找‘小廖’(即廖承志)商量。

一九四〇年九月，我参加‘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任务完毕，即将离渝返新加坡，周副主席写了一张条子，叫我带给廖承志同志。廖承志同志提出您胡愈之的名字，我认为非常适宜，傅无闷经理一定会同意。因为您胡愈之所写的国际问题的文章在南洋风靡一时，《莫斯科印象记》影响很大，又是《东方杂志》的主编，陈嘉庚先生曾在那杂志上发表过自传……廖承志同志为能这样一拍即合很高兴，事情就算定了。”

我当时不是公开党员，虽然我三十年代就入了党，但是我写的进步文章，南洋的报人和读者都知道，公开去新加坡很不容易。因为这是政治斗争，国民党也想占领舆论阵地，也准备派人

China

去南洋办报，拉拢华侨群众。一般象我这样的人去新加坡都是坐二等舱，坐二等舱需要办护照，而护照要向国民党当局办，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我。名字可以改，相片却无法改。我只有坐三等舱、统舱去。坐三等舱不用护照，但必须在新加坡附近的一个小岛（旗章山）上扣留一礼拜，名义是检查有没有传染病，实则是专为穷苦百姓而设的一种侮辱性检查。廖公很精明，他事先叫我找一个英国医生看病，让医生开条子证明我没有病，实际是给一百块钱买一张证明。这样，我出示英国医生的证明，就可以免去检查的侮辱，合法上岸。香港的国民党特务也厉害，他们对我的情况也掌握一些，曾电告英殖民当局：胡愈之坐三等舱去新加坡，设法不许他上岸。三等舱条件很差，空气污浊，拥挤不堪，食物特差，没法吃。但是可以去二等舱吃饭，另外花钱。我与王纪元同行，在去二等舱用饭时，极凑巧地碰见了张楚琨的小女儿咏莹。她当时才四、五岁，长得很象她父亲，我看着觉得面熟，就逗她讲话。才知道楚琨夫人吴梅丽就在船上。我们一路彼此照应，终于平安抵达新加坡。

在新加坡上岸第二天，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南洋商报》刊出我和王纪元两人合照的照片，附志新闻介绍如下：

> “本报新聘国际问题权威胡愈之先生为编辑主任，聘名记者王纪元先生为编辑，二氏均已开始视事，本报暨《新国民日报》同人昨在大同酒家设宴欢迎。胡氏服务国内出版新闻界十数年，经验极为丰富，对本报有不少革新计划，本月内将作初步改进，迨明年一月本报将以崭新的姿态与读者见面。”

英殖民政府见报吃了一惊，胡愈之怎么来的？怎么没有查到？他们于是通知报馆，叫我去华民政务司（英殖民当局所设专管华侨的机构）谈话。假定说我不是合法上岸，或者叫他们查出一点什么小毛病，就将被控为偷入境，他们是可以叫我原船返回的。报馆懂得他们这一套，马上为我赶印了一批名片，我就带着

这名片去华民政务司谈话。他们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

我递给他们一张印着“胡学愚字愈之，南洋商报总编辑”的名片。

他们又问：

“你是怎么来的？”

“因报馆要我火速启程，来不及办护照，我只好坐三等舱，但是合法上岸的。”

英国医生要了我一百块钱就不提了，给他们留点面子。他们为什么没有查到我胡愈之呢？因为我一路上都是用胡学愚——这是我的本名，我很少用它，知道的人就更少了。他们也知道中国人的名字很复杂，又是本名，又是字，又是号，一般为了表示尊敬都称字。我用胡学愚既不是化名，也不是假名，至于他们不知道胡学愚就是胡愈之，只能怪他们孤陋寡闻，他们是有苦说不出，只能让我留下。沈兹九是第二年来的，坐的也是三等舱。她从皖南事变中侥幸逃脱出来，没有地方好去，就上南洋来拓荒。周恩来同志想得很周到，叫她来协助我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密切，相互间渐渐产生了感情，我们不久就在新加坡结婚了。此外，还有乔冠华和郑森禹同志，也是第二年坐三等舱来南洋，但是英殖民当局就是不准他们上岸，硬说他二人的名字是假的，而原来的真名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因为乔冠华曾用“乔木”做笔名，他们就说他是延安那个著名的中共政论家胡乔木)，结果郑、乔二同志只有徒劳往返，又乘原船回去了。

在我就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恰好一个月的时候，陈嘉庚先生从祖国返回新加坡了。他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全国各地慰劳视察了九个月。在李铁民、侯西反的陪同下到延安访问了九天，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长谈多次，明白了国共摩擦的真相，深为延安军民一致、团结抗战和民主化的新气象所感动，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腐化，“蒋介石狡诈独裁”

相比较，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他明辨了是非，终于由一个坚决的拥蒋派转变为拥护共产党了。事实完全证明了周副主席的卓见和预言。陈先生经过仰光，沿着槟城和马来亚各大城市南下，宣传团结抗战，说明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受到各侨团和侨众极为热烈的欢迎。到达新加坡恰好是一九四〇年岁尾最后一天。陈先生想不到我已来新加坡就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见到我高兴极了，对怡和轩的同人连声说：“深庆得人，深庆得人！”

二、我与《南洋商报》

新加坡简称星洲、星岛，又称狮岛，日本占领期间曾一度改名昭南岛。这里不但是南洋华侨最集中的地方，亦是英帝国的军事重镇，并已成为海外一千一百万侨胞反侵略运动的中心。

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已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寇在中国的泥足愈陷愈深，面临最后的严重危机。为了应付国内外的危急局势，日本不得不一面向中国的投降派采取诱降办法，捧出汪（精卫）记班，施挑拨离间的毒计，对中国发动“政治攻势”；另一方面则准备再来一次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进攻。面对敌伪顽固反动势力的威胁利诱，重庆当局显得软弱动摇，心怀叵测。国统区内一片乌烟瘴气，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社会腐败黑暗，官吏贪污溺职，还不时制造国共摩擦。广大爱国华侨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抗战的前途，忧心如焚，对党派之争极为反感。但是，由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国民党在南洋华侨中影响很大，公开的骂或捧都不受欢迎。我们反正是为了抗战，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抗日人人都欢迎，我们就专讲一致对外，抗日建国。

当时新加坡的华文报纸，除了《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还有销路不大的《总汇报》等。福帮——福建人大都看《南洋商报》，广东人多喜读《星洲日报》，而《星洲日报》的老板胡文虎却并不是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东人，而是福建人。这两家报纸都是当地大报，相互竞争很厉害，总是对垒。

《南洋商报》是陈嘉庚先生于一九二三年创办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由陈先生的女婿李光前的弟弟李玉荣任董事长，董事经理是傅无闷。傅是老报人，很懂得迎合时代潮流，迎合广大爱国华侨的心理。而要迎合华侨读者，就要拥护陈嘉庚先生及他领导的南侨总会。这一切，与我来南洋的目的竟是天然巧合，这对于我的工作将极为有利。更有意思的是，这么一家销路较佳，影响不小的大报，长期以来却一直没有总编辑，也无专人负责撰写社论，而是由董事经理傅无闷，副刊编辑张楚琨等轮流主持笔政。一般要两三天才发一篇社论，并不是很有计划、有系统的，也不大讲究前后呼应。虽说那些社论各具特色，却几乎是各自为政。自从我进《南洋商报》担任编辑主任，王纪元接张楚琨编副刊《狮声》，楚琨转而主编该报晚报。由于我曾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在“国际新闻社”工作过，又写过不少政论散文，因此，从一九四一年元旦起，这写社论的工作就自然而然落到了我的身上。我每星期要写五、六篇千五百字左右的社论，用四号字排在第一版左下角，除了有特稿，须让出社论版位以外，平均是一天一篇。另外，我还要为星期刊写些较长的专论，一篇三几千字到一万字左右，有时也要给晚报写点简短的时评。

那时在海外办报，第一件苦痛的事，是关于中国的消息来源太少，而且太慢。我有一个较好的条件，就是有“国新社”的全力支援，并与香港有较密切的联系。《南洋商报》的“国际新闻”、“祖国要闻”，主要靠“国新社”提供。另外也依靠各国通讯社如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等的电讯和特约专电。“本埠新闻”、“本坡新闻”，则由我组织领导的一个采访委员会供稿，侧重于采访报导当时当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抗日救亡活动实况，颇受读者欢迎。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抗日战争的最新消息，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都较及时准确地在《南洋商报》得

China

到反映和披露。每天的社论，尽量做到根据华侨社会的所想所急，对动荡激变的世界形势，对摇摆不定的国内政局，进行周密分析。写读者心中所想，析读者思想所虑。文章态度力求客观公允，不偏不倚。语言文字尽量通达简炼，深入浅出，雅俗皆宜。总的目的是呼吁以国家民族为重，以大局为重，要求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要求民主进步，反对专制倒退。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社论常注意引用发表蒋介石关于“领导救国救民的革命大业”“做到绝对精诚团结”所唱的种种高调，一方面借以打击汪逆的卖国投降路线，另方面也使蒋介石言行相悖的嘴脸暴露无遗，并使他在要两面派手腕时有所顾忌，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团结则存，分裂则亡》、《新四军事件所引起的国内外反响》等社论，不但简单扼要地公布了皖南事变这一“千古奇冤”，而且一再引用蒋介石在各种时间和场合发表的那些冠冕堂皇“要始终保持统一，并且要继续巩固团结”的“训示”。并郑重宣布“我海外侨胞，其中最大多数，一向是无党无派的，我们心中只有国家民族，我们决不存党派偏私之见。现值大敌当前，失地未复，我们所要求的是抗战建国，是民主团结，我们所反对的是和平妥协，是内战分裂”。正是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意志面前，那些妥协投降派才龟缩起来，那位“蒋委员长”才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日寇秘密媾和，只好勉为其难地继续扮演“最高抗日领袖”的角色，“团结抗日到底”。

为着孤立日本法西斯强盗，结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在《日本军事冒险的最近动态》、《论英美在远东的合作》、《感谢友邦新闻界的关心》、《论保卫南洋》等社论里，一再指出，“一个民族，断不能完全倚靠外力以求独立解放，何况英美在目前是不是能用武力制止日寇的侵略也还是一个问题。”“要制止日寇的侵略，英美在远东的彻底合作，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一再论述中国抗战对远东和平，以及世界形势的影响。“美国是否必须在两洋同时作战，是要看中国抗战是否能坚持下去”。“今天中国的团结抗战，已经

是和远东和平不可分离了”；“我们不要忘记，在决定时局动向的各种因素中，中国也是重要的一个”；“要保卫南洋，首先得加强中国抗战，只要中国把日寇拖得半死半活，南洋根本就不会发生战事”；“所以我们认为保卫中国第一，保卫南洋第二。这不是我们华人自私的说法，为南洋各属打算，为英美打算，亦是如此”。这些社论的论点得到当时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的赞同和响应，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英美继续对日本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以至终于演成奇袭珍珠港事件。

支持和帮助陈嘉庚先生及南侨总会的爱国筹赈工作，促进南洋华侨的团结进步，是《南洋商报》的主要责任。自从陈嘉庚先生率南侨慰问团回到南洋，在星岛快乐体育场向侨胞如实报告了他视察国内各地的见闻和观感，把重庆和延安作了对比，把国内抗战的真实情况和国共摩擦的真象公之于众，从而把南洋华侨的爱国救亡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蒋介石对这位一向支持他的“财神爷”的“反叛”，当然不能善罢甘休。蒋的特使、国民党政府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及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之流，就竭力造谣诬蔑陈先生，并利用华侨中的帮派体系反对陈先生及他领导的南侨总会。以此破坏南洋华侨的团结，达到他们混水摸鱼、坐享渔人之利的险恶用心，因而受到陈先生及广大爱国侨领、侨胞的坚决反击，形成一场尖锐的斗争。《南洋商报》意在揭出吴铁城、高凌百之流的鬼蜮伎俩，全力支持陈先生及南侨总会的爱国筹赈运动。在《国父与华侨》、《对敌总反攻的必要条件》、《欢迎南侨大会代表》、《我们需要陈主席》、《公意的胜利》等社论中一再指出：“在今天，团结是比金钱和军火更为宝贵的”，“我海外同胞，不论是国民党员也吧，是无党无派也吧，我们要保持华侨过去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南侨总会会员大会召开之际，吴铁城、高凌百之流，阴谋煽动，使陈嘉庚先生不能继任总会主席，以便在华侨中制造分裂。《南洋商报》在会议期间，一天一篇社论，总结和肯定南侨总会成立两年半以来，“领导了全南洋华侨

的筹赈救亡工作，发动了一千一百万的侨众，筹募了三万万元的赈款，献给抗战中的祖国”，“表现了侨胞的坚持抗战，表现了侨胞的坚持团结，表现了侨胞的反对投降妥协”。揭露敌伪“正在用挑拨离间的毒计，向我采取政治攻势，以便于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连日东京广播电台，竟至含血喷人，诬蔑我南侨总会和南侨领袖，说是因不满中国政治，而将脱离抗战阵营”。敌人的造谣诬蔑激起了广大侨胞的憎恶和义愤，他们以“不分党派，不分帮派，不分老幼、不分贫富、不分智愚”，全体绝对一致地拥护陈嘉庚主席和他所领导的南侨总会，以华侨的精诚团结，作为对敌伪反动派的回答，社论喊出了广大华侨的心声：“我们需要陈主席！”“全场一百五十二名出席代表，却有一百五十一名投票重选陈嘉庚先生为主席，只有陈先生本人的一票除外”；“可见全南洋华侨，不论是国民党员，或非国民党员，都是绝对接受陈嘉庚先生一向所坚持的团结抗战主张与无党无派立场的。这样，那一班专事制造摩擦，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破坏南侨总会的分子，已被打得落花流水，华侨的团结是大大加强了。”这篇社论就以《公意的胜利》为题。而这“公意的胜利”中也包含着《南洋商报》及我们许多同志的操劳和心血。

一种报刊若是能够成为社会的耳目，民众的喉舌，传达人民的公意，社会的真理，成为舆论的先驱，就必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社会的热情欢迎和支持。继我之后，刘尊棋、张企程、蔡馥生等同志也陆续来到《南洋商报》，真正是编辑班底雄厚，人才济济。由于全体一致地团结努力，《南洋商报》负起了引导海外华侨舆论的重责，触角伸向华侨社会最敏感、最关切的各个角落，成为华侨社会观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了解祖国的真实情况的良好渠道，赢得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华侨青年读者的心。因而销路大增，风行新马，一时间跃居为南洋侨报之首，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同时，这个时期亦是南洋华侨爱国运动最活跃的时期。《南洋商报》的成功，使其他华文侨报也竞相效尤，纷纷到国内聘请

编辑，改造报纸。如应《总汇报》之聘而来的乔冠华和郑森禹，却因英殖民政府的故意刁难未能登岸，使《总汇报》大为遗憾。我的老友俞颂华曾一度入主《星洲日报》，使我们两家一向对立的竞争对手，一度出现团结融洽的气氛。后因国民党派了林蔼民、潘公弼来接管《星洲日报》，颂华才被迫离开星洲，返回香港主持《光明日报》。还有邵宗汉进入槟城《现代日报》，杨骚也由国内来到怡和轩南侨总会，主编《闽潮》。刘思慕拟去《光华日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如愿。新华社在星岛建了分社，生活书店也来开了分店，许多在国内的"禁书"，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在南洋却得以流传。总之，南洋成了我们的同志的一片广阔的活动天地。

除了办报以外，每周我总有一日由张楚琨陪同去怡和轩陈嘉庚先生家里，同他进行长谈。陈先生是一位事业家、实干家，他既要忙南侨总会的筹赈救亡工作，还要经商、办教育，确实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每次见面总是地北天南无所不谈，谈国际形势，国家大事，国内的抗日运动，谈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毛主席的言论著作，解放区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我尽量为他提供全面情况。

令人遗憾的是我俩语言不通，陈先生满口福建话，我是一口上虞腔，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幸亏张楚琨会一口流利的国语，他自然责无旁贷地当了我们的"翻译官"。陈嘉庚先生为正义、为真理斗争的精神，和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的作风，还有他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全力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行动，我是衷心敬佩的。其时，我也参加领导新加坡文化新闻界的抗日工作，并负有统战任务，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我负责的"民盟"海外支部中的许多成员，都是著名的爱国侨领，华侨巨商，我们有着共同的工作目标，当然会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我们虽然语言不通，却因为有一位理想的"翻译"，每次都谈得十分投契和畅快，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陈先生与他所主持的南侨总会，一直得到毛主席、

周总理及廖公的关怀、帮助和支持。以正义老人陈先生为首的广大海外侨胞，不但在经济上接济祖国．也在政治上推动祖国的民主与进步。当时新加坡的抗日救亡团体没有一个被英殖民政府承认为合法的。就连南侨总会，也只被当作一种筹赈祖国难民的慈善机构才得以存在。其他抗日团体则以体育会、音乐社、话剧社等不同名义得以注册。那时新加坡国民党特务、美国特务不少，陈先生手下一些爱国救亡工作人员，如侯西反、白仰峰等等，都被英殖民政府放逐出境了。有的被押解移交给中国国民党反动当局，有的甚至被直接送入集中营，从此下落不明……英、美和日本虽然互有矛盾，但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所谓"惺惺惜惺惺"，他们在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上是一致的。虽然英、美、中同属"同盟国"，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还是使他们心怀忐忑，而华侨在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大量筹赈汇款，又直接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海外侨胞爱国也是"有罪"的，是必须冒着被放逐、监禁的危险的。广大爱国华侨，为抗战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我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中旬发表的《论保卫南洋》等六篇社论中，曾一再论及如何保卫南洋，如何避免战火南延。从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中，我已预见到日本侵略强盗的猪鼻势将南拱，但若能运用"援助中国抗战，加强英美合作，厉行对日禁运，实现远东民主"四件"法宝"，就可以保卫南洋。因为日本的作战资源及外汇，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取自英美及南洋各属。要是英美及南洋各属严厉地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切断日本的作战资源和经济命脉，日寇一定支持不了几天，甚至可不战自败。但是，当时的英美统治者，始终不能抛弃对法西斯妥协的幻想。甚至当欧战发生之后，对日本还采取绥靖政策，一边纵容日本进攻安南（越南），一边封锁滇缅路，保持"中立"断绝对华物资接济。直等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的炸弹轰到头上，侵略的炮火逼到眼前，他们才手忙脚乱地布置军事，动员民众，应付战争。但

是已经迟了，太迟了！珍珠港事件与马来亚之战，实在是英美对法西斯绥靖政策的自作自受！他们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三、从撤离围城到重归星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日。星期日的半夜，快到天明了。爱逢场作戏的人们，从跳舞场散出来，回到家中，睡下还没多久。“轰”“轰”的爆炸声惊醒了新加坡市民的甜梦。打开窗子张望，街灯还是光亮的，没有放警报，没有灯火管制。但是炸弹已从市空落到头上来了，有许多处房屋燃烧起来，战争爆发了！日寇的侵略猪鼻拱到了南洋！纸醉金迷的星岛，从这一霎那，已经面目全非了。

十二月十二日，屡建战功，名闻遐迩的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被日本飞机炸沉。南暹北马许多地方遭沦陷，槟城、怡保、吉隆坡等相继被占领！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英军从柔佛新山撤退到柔佛海峡南岸的新加坡岛，新加坡成为“四面倭歌”的孤岛了！

在这兵临城下，战火纷飞的时刻，我们文化界的同仁，决心投入抗敌保卫星岛的群众热潮，立即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参加的有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以及郁达夫、王叔旸、沈兹九、王纪元、张企程、杨骚等。郁达夫为团长，我为副团长，张楚琨任组织部长，王叔旸任宣传部长，庄奎竞任训练部长。紧接着，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也成立了，主席陈嘉庚，我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郁达夫为执行委员。我们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一面在炮火中培训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外还组织演讲队、戏剧队、歌咏队，到群众密集的地方去进行抗敌宣传。《南洋商报》仍坚持每天按时出版。英殖民当局直到兵临城下，才临时抱佛脚，允许华侨参加抗战。但是又惧怕武装起来的人民将来倒转枪口对准自己，于是他们又重演

China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故伎。将大批新式武器填海，而发给那些由华侨青年和被释放的政治犯(绝大多数是马共党员)自动组织起来的义勇军、突击队的却是十九世纪的破旧枪弹，忍心送那些优秀的热血青年去做炮灰。更有甚者，丝里打军港被英军自动炸毁，这个军港有世界第三的大船坞，有足以打穿世界最大主力舰甲板的海防大炮，它使新加坡能够自夸为"攻不陷的要塞"，而它未放一枪一炮就自动炸毁了！英国侨民开始撤离，投降将军白思华，就要率领十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向三万日军投降了！而我们抗敌动员总会，和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却不顾隔岸频频打来的炮弹，不顾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仍在加紧进行抗敌工作，准备与新加坡共存亡。而英殖民当局一系列放弃新加坡的迹象，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看来英政府没有保卫殖民地的能力，准备不顾殖民地人民的命运，让他们赤手空拳遭受日本法西斯的屠杀和奴役。陈嘉庚先生于一月三十日往见星洲总督汤姆斯探询情况，从汤姆斯支支吾吾的言词，不难断定他们已下定投降决心。而重庆政府来电要求安全撤退总领事馆人员及官方代表，却无只字提及抗日侨领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陈先生愤慨之极，当机立断召集抗敌动员总会总部工作人员谈话，表示："新加坡总督准备当俘虏，我们可不能！"并通知大家，为免遭日寇的残酷报复，务必设法迅速撤离这个随时准备举白旗的围城。

陈先生于二月三日凌晨，与刘玉水等乘木材商人陈贵贱的运材小火轮，悄悄地转移到苏门答腊的英德其里港去了。等到陈先生安全离去之后，我也召集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负责人员开了二十分钟的紧急会议，大家一致决定迅速撤往苏门答腊丛林，于次日凌晨动身。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我们一行二十几个人，乘一只由张楚琨和刘武丹费了大力气才接洽到的破旧小电船，沿着新加坡河狭小的河道，驶向布满水雷的海面，离开了围城新加坡。幸喜小电船吃水不深，我们才侥幸得以安全驶过布雷水域。沿途看到熟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